



《新民周刊》：您认为正因为媒体“短平快”的特性，也因为身处危机时刻，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往往来不及深思熟虑，往往脱口而出，不够周密，多思想火花，而少了一些系统性的思考，这个判断是不是同样适用于鲁迅？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该如何思考与表达？

陈平原：我不认为“系统性”就是思维和表达的最高境界。某种意义上，过分强调“系统性”，反而可能落入重床叠屋、夸夸其谈的学院派的窠臼。对于鲁迅等新文化人来说，直面人生苦难的同情心、理解历史的洞察力，以及介入当下社会变革的直接性，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上海十年，鲁迅主要选择匕首与投枪的“杂文”，明摆着就不是以“系统性”为奋斗目标。

关于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思考与表达，我写过不少文章，比如二十多年前的《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强调“阅读过程”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信息’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人生智慧’以及‘生命境界’。前者属于公共资源，确实可以金钱购买；后者包含个人体验，别人实际上帮不了多少忙。”至于表达，我关注时势、技术、学养、文体四者之间的张力。之所以表达越来越情绪化，受众立场越来越趋极端，与算法精准推送导致的“信息茧房”有关，也与追求流量以获取收益的写作心态有关。这个状态，短期内不会改变，对于有理想、有良知的读书人来说，“修辞立其诚”，成了必须坚守的写作底线。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五四精神非常突出。



## 五四运动同时也是说出来的

《新民周刊》：海伦·斯诺在《阿里郎之歌——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五四运动受到朝鲜三一运动的影响，关于朝鲜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您是否有关注到？

陈平原：多年前我在韩国演讲，就碰到这样的提问。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朝鲜的三一运动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历史事实，我们从不否认。翻阅五四时期旧报刊，大量有关三一运动的报道，而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学生辈的傅斯年、罗家伦等，都曾写过文章大加赞许，表达敬佩之意。应该说，这些资料中国学者都熟悉，比如《世界历史》1979年就已刊发杨昭全的《现代中朝友谊关系史的开端——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间两国人民相互支援的史实》，此后，学界更是不时出现这两个运动的比较论述。可是，为什么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很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都不怎么看重这一影响呢？其中奥秘，王晴佳曾谈及，那是因为我们强调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连续性：“由是，五四就成了一个象征符号，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史册；而五四作为一场由于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谈判挫折而引发的学生游行示威，